

百村调研

第23期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

2011年6月27日

七天那些事儿 ——记“百村调研”汶川草坪所见所思所感

五团（四川汶川）4组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孙宇飞

2011年5月22日~29日，按照国家机关团工委的要求，随交通运输部组织的第五团奔赴汶川开展“百村调研”活动。我所在的第四组被安排到三江乡草坪村。在这七天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和感受到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深刻体会到草坪村民的幸福生活。这七天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这七天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所思所感将使我终身受益，这七天的经历我将终生难忘。

我和汶川的故事

提及汶川，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说出些与它的关联。的确，在那场牵动全国人民心弦的灾难中，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汶川做些什么，无论是置身其中，还是置身其外。

2008年，我正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读博。5·12地震不久，中科院接到国务院的批示，要

求尽快提出灾后重建规划，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角度论证各受灾地区是在原址重建还是另选地方。我有幸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负责从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的角度分析论证。在接到任务的半个月时间里，每天都吃住在实验室里，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接到师兄从灾区发回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在后方分析、加工、计算出结果，然后讨论、修改，再把结果反馈给总课题。就这样，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下，我们提前按国务院的要求完成了研究任务。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很累，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过一句；虽然睡眠很少，但大家却都很亢奋；虽然没有任何回报，但大家都明白这是我们唯一能为灾区做的事情。也是从那次起，我患上了心脏供血不足的毛病，现在熬夜或是劳累过度还是会感到心痛。

这就是当年我和汶川的故事。时隔三年，终于有机会来到汶川，带着那份特殊的情感，亲身感受

和见证灾难带来的悲痛和灾后重建的奇迹，也期待着我与汶川新的故事。

地震带来的缘分



戴鹏，三江乡副乡长，35岁，算来也是我的同龄人，但他已在乡村工作了十几年，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

经验。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有着远胜于同龄人的成熟和老练。初到时，在映秀去往三江乡的路上，刚好遇到堵车，于是他利用这段时间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着三江的自然情况、历史和民族文化、经济情况、受灾情况和现在的发展形势。

他说，现在是三江最困难的时候。地震时三江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对景区设施、道路等基础设施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在各方的帮助和努力下，各项设施基本都重建起来，旅游产业也稍有起色。

然而不久又遭遇8·14泥石流，之前的努力再次付之东流。现在三江仍处于灾后的重建阶段。灾害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设施的破坏，更直接的是影响了旅游产业，进而影响到众多以旅游产业为生的老百姓。

对于三江未来的发展，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和思考。他说，三江和水磨相邻，无论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还是基础设施建设上，三江都远落后于水磨。所以三江的旅游不能跟着水磨走，而是要有自己的特色，目前三江正在着力打造“水乡藏寨”的旅游品牌，希望通过自己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另外，完全依靠旅游一个途径也是行不通的，就像这两次受灾的教训，一旦旅游产业受阻，农民缺少其他的谋生途径，对百姓的打击太大了。受地处自然保护区的限制，三江不能发展污染型的工业，于是乡政府正在尝试着发展特色的种植和养殖业，希望在猕猴桃、杜仲、野山鸡等种植和养殖方面闯出条致富的路来。到那时，三江的经济将两条腿走

路，百姓的日子也会好起来。

一路上，天气逐渐由阴转晴，配合着车子里飘出的伍佰的《美丽新世界》，让我们对三江的发展也充满了期待。

当我提起我们的相遇相识是种缘分的时候，他笑着说：“地震带来的缘分”。话里透着几分相识的愉悦，也有几分苦涩与无奈。

每天一杯清茶

我住的农户家户主叫张国荣，一位68岁的老人，曾是草坪的村支书，所以我唤他为老书记。老书记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话不多，口音很重，开始和他交流只能听懂三四分，剩下的要么靠手势比划，要么就只能靠猜了。

老书记是村里的保洁员，每天早晨都要把整个村子打扫一遍。入住的第一天，我六点起床，就发现老书记已经开始打扫了。我从他手里接过扫帚，他也没过多谦让，回屋又拿一把扫帚和我一起打扫。扫除后，他笑着对我说，“走，喝茶去。”回到房间，拿出一个早已泡好茶叶的玻璃杯，那是一个被浸渍得已经不太透明的玻璃杯，但我相信这可能是老书记家最好的杯子了。于是，接过杯子，没有任何犹豫，一饮而尽。喝完后，发现老书记正开心地注视着我。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的打扫卫生和劳动后的一杯清茶成了必修课。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和老书记的关系逐渐拉近，他说的方言我似乎也能听懂更多些了。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无论我在哪，老书记都会亲自走过来喊我：“小孙，回家吃饭喽。”

在这七天里，我能感受到我是真的融入了这个家庭，而他们也从内心接受

在这七天里，我能感受到我是真的融入了这个家庭，而他们也从内心接受



乡村的晚高峰



干净的草坪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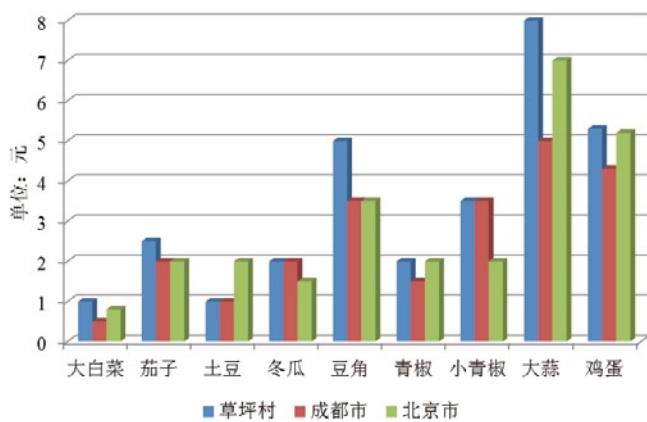
了我。

离开的前一天晚饭时，老书记突然说：“小孙，你走了，我会不习惯的。”我的眼眶随之湿润了。

那晚我虽然准备汇报材料到凌晨3:30，但还是5:30就起来了，比平时还要早半小时。我独自出去打扫美丽的草坪村。回来时，老书记拿着我熟悉的杯子已经沏好了茶，我接过杯子对他说：“我会回来的。”

农民吃的菜为何比城里贵？

在多数人看来，农村的菜应该是既新鲜又便宜的。然而在草坪村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据调查，草坪村一些常见菜的价格不但比成都贵，甚至比北京还要贵（见下图）。



草坪村、成都市、北京市三地菜价比较（5月26日）

表面来看，运输成本高和缺少竞争是高菜价的直接原因。草坪村距离乡镇较远，蔬菜是商贩用汽车运来，形成流动的菜市场。每隔一天会往村里送一次菜。由于运输成本高，再加上缺少良性的竞争，致使菜价较高。在这种条件下，菜价对市场供应变化的反应也不明显。如前段时间由于各地出现买菜难而导致蔬菜降价时，对这里的菜价几乎没有影响。据了解，三江乡像草坪村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震后草坪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震前，大多数村民居住生活在山上，距离自家的耕地很近。那时基本没有撂荒地，耕种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收入来源之一。平时在田间地头种点青菜足够一家人吃的，多余的菜还可以送到三江乡或是都江堰出售。

地震后，政府对当地进行了重建规划，村民都到山下盖起来新房集中居住。这从客观上也造成

了劳动力和土地的分离。这一方面由于每次耕作需要走很长的时间，增加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距离过



流动的菜市场

远，耕种后的庄稼不好管理，经常被野猪、猴子等野生动物破坏，难有好的收成，再加上打工的机会成本更高等原因，所以村民们基本不再种粮种菜。据统计，目前草坪村共有耕地888亩，其中退耕还林582亩，实际耕种161亩，撂荒145亩。而我们从村民处了解到实际耕种的面积还要远小于这个数字。

可见，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导致农民吃的菜比城里贵的深层次原因。而且这种改变几乎是不可逆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让农民搬回山上居住，或是重新耕种了。如今，只能希望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在关注城市菜篮子的同时，也关注一下草坪村这些特殊地区的菜价，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改善农民的吃菜难问题。

住着大房子的贫困户

震后，按照规划要求，村民纷纷下山集中居住。在政府的扶持下，家家盖起了新房。按照每户人口的不同，政府一户少则补贴1.6万，多则补贴近3万。同时，还为村民提供无息贷款服务，按照信用等级，最多可无息贷款2万元。此外，政府还将对房子的外表进行风貌改造，每户约投入8万元。在政策的引导下和对未来旅游市场的看好，村民纷纷盖起了可以商住两用的农家乐。

按照当地的行情，盖一户像样的农家乐仅建材就需要十几万。多数房屋都是农民自己设计、请亲戚朋友帮忙建造，这样可以节省几万块的工钱。尽管如此，各家各户基本还是要借钱盖房，多的几十万，少则十几万。为了



风貌改造后的农家乐



未装修的毛坯房

避免高额的利息，村民很少选择贷款，而是向亲戚朋友们借钱。

与光鲜的农家乐外表形成对比的，是

房间内的装修和卫浴等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资进行了风貌改造，并没有对房间内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这笔资金并不比盖房子的投入小，再加上近两年旅游市场又不景气，农民不敢再借钱或是贷款来投入到装修上。因此，目前多数家庭还达不到营业的条件。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没钱装修不能营业，不营业没有收入还债。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家庭往往靠外出打工来维系着基本生活。由于当地村民极为重视民间的信誉，打工赚来的钱除去基本的生活开销外都用来还外债，基本没有用在房屋的装修上。农户们往往是住着1000多平米的大房子，家里却是一贫如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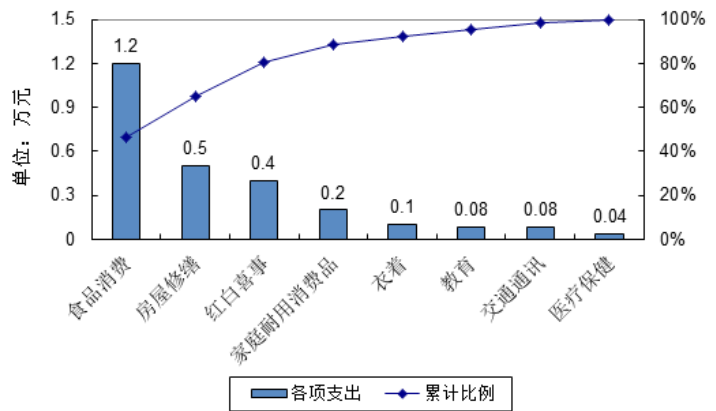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地想办法。在与村支书的访谈中，他表示希望由村政府做担保，再贷一部分资金给这些农户用于装修和基础设施建设，尽快达到营业的条件。然而，在村民们看来，他们已经不敢再借钱或是贷款了。

经过不断的调研和访谈，我们也在不断探寻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当地旅游产业的建设，增加当地旅游的吸引力，让村民们预期到未来发展的前景，增强村民进一步投资的信心；二是通过宣传，吸引成都、都江堰等邻近城市游客的投资，比如游客投资1万元，装修一个房间，可以在三年内随时入住。这样，村民有了资金来源，投资者也相当于在草坪村有了自己的别墅，达到双赢的结果。

礼金的烦恼

礼尚往来，自古以来是我国民间的传统，哪家有个大事小情，摆下一顿宴席，邀请几个亲朋好友共同庆祝，随点礼既表达祝贺之情，也减轻主人家的负担，同时还增进了亲戚朋友间的感情。然而这本应是主动为之的感情走动，却成了村民被动的负担。

在草坪村民的支出调查统计中，可以发现，红白喜事支出排在第三位，占全部支出的15%以上，仅次于食品消费和房屋修缮。而这一数据是对10个典型农户调查的平均数，在个别家庭，一年仅礼金支出就有六七千，这在平均收入仅有3249元的草坪村，相当于两个劳动力全年的收入。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村民的收入中，并没有红白喜事这一项。按理说，长期来看红白喜事的收入和支出应该是基本持平的，总体不会给村民带来太大的负担。但通过调查，结果却并非如此。



草坪村民支出结构图

一是随礼的名目多。说是红白喜事，但现在随礼的名目已不仅限于此了，盖房子、生孩子、满月、生意开展、老人过寿、孩子上学……都成了随礼的理由。谁家不办要么被人说不孝顺，要么是没能耐。

二是礼金水涨船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礼金的价码也不断攀升，如今100元钱即使在农村也已经拿不出手了，礼金的起步价最少都要200元钱。遇到直系亲属或是关系近些的，礼金还会更重些。

三是谁也没赚到钱。农村请客都是请专业的厨师团队来帮忙，一桌要320元。而往往是一家随了200元钱，全家来吃饭。以某村民盖房为例，总共摆了80桌，刨去收到的礼钱，自己还要搭上几千块钱。这样送礼的、收礼的谁也没赚到钱。

好在草坪村倒还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礼越随越厚，感情越随越薄”的现象。但随礼的确成了村民的一种负担和烦恼，而这种几千年形成的乡俗民约，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不过在调研中，可以看到村民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往往只随礼不去吃饭；除了红白喜事、老人重要寿辰等必办的宴请外，其他的不再张罗

了。估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礼金的烦恼会越来越小。

三代村支书的苦与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草坪村的发展脉络，我们和村里的三代村支书进行了访谈，从中既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下的带头人的苦与乐，也可以看出党的农村政策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张国荣 1971~1985年任草坪村村支部书记

张国荣书记是1943年生人，在村子里的辈分很高，很多同龄人也唤他“老辈子”（长辈的意思）。他当书记的时候，村里有370多人，基本都在家务农。那时候全村有1000多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土豆，亩产能达到300~400斤。当时草坪村的收入在全乡处于中等水平，基本能解决温饱问题。

当时国家正处于特殊时期，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要求各地农业学大寨。老书记带着全村人去修梯田。结果，梯田修了不少，但并不适合当地的种植条件，基本都荒废了。

问及老书记在他任期内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讲：修路。由于交通不方便，当时农民卖粮相当困难，只能靠人力往乡里背，一天最多两个来回，也就背100多斤。然而修路又谈何容易，按当时的财力，政府根本顾及不到一个村子的发展。80年代初期，老书记迎来了修路的最好时机，当时成立卧龙自然保护区，草坪村被划入保护范围，作为不砍伐树木的补偿，政府一次性补助15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老书记决定用这笔钱买材料，村民出工出力，合力修路。然而这一方案最终被乡政府否定了，那笔钱被用于投资建设水电站。刚开始的几年村民还参与分红，后来水电站被拍卖了，这笔资金既没有退股也没有后续的分红，村民的股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谈到政策的变迁，老书记直夸现在的政策好。



听老书记讲过去的故事

他说自己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张书记当支书的时候，也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全靠挣工分，当书记虽

然有工分但是很少。再加上家里孩子小，没有其他的劳动力，年终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向亲戚借粮。后来，政策逐渐调整，从包产到劳到包产到户，再到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家里的日子才逐渐有了起色。他说过去就连杀猪都要交税，现在不但不交税，种粮还有补贴。日子也越过越好。现在的生活就是他眼里的小康生活了。

对于村子未来的发展，老书记对目前以旅游为主的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尤其是两次自然灾害时期旅游产业不景气给村里经济带来的惨痛教训。他说，还是要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这才是农民该做和能做的事。

陈怀友 1985~2007年任草坪村村支部书记

陈怀友书记是1944年生人。张国荣任书记的时候，他就任村长，85年，张书记退任后，他当选为村支部书记。陈书记将自己在任期间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后到20世纪初，支书的工作重点是带着大家千方百计搞创收。

80年代初，村里的人口迅速增加到390人，那时每家每户都有3、4个孩子。在国家政策的要求下，计生工作成了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比那段历史，陈书记说，转变村民的观念和适当的政策引导是最重要的。现在村民都意识到孩子多是负担，你让他生他都不生了。像草坪村的三队，按政策每户是可以生三个孩子的，现在最多生两个。农民生男孩主要是考虑养老问题，后来当地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如果村民二胎都是女孩而不生第三胎的，由政府来保障养老问题：夫妻双方任何一方到达60岁以后，每月每人可以领60元的补助。钱虽然不多，但配合其他的政策基本能保障生活开支。在这样好政策的引导下，即使两个都是女孩，村民也不再生了。

90年代中后期，陈书记的工作重点放在了除了传统的农业以外如何为村民创收上。草坪村山上有一种漆树，是漆家具、木船等的主要原料。并且这种资源是可持续的，每棵树每天割一次，可以连续取七天，而七天后漆树里的漆又重新长满。最多的时候，全村一年可以收集5吨的漆，当时的市场价格是10元/斤，为全村创收10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并且家家户户都有。所以那时草坪村的日子是很富裕的。

问及漆树的现状，陈书记轻叹了一口气，说，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一斤漆能卖到70~80元，按理说村民的生活应该更好些。然而割漆树是很辛苦的，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割，太阳出来了漆就不流了。村民不愿吃这个苦，就把漆树承包给外人了，一包就是三年。这些人来了就是对漆树掠夺性的开发，三年后，所有的漆树都丧失了产漆能力。他们也知道这里不再产漆了，也不再要求继续承包。于是一条很好的创收之路就这样断了。

在陈书记眼中，做得最满意的事就是把村民们引下山来。90年代末期，随着三江风景区的开发，陈书记把目光放在了更有发展的旅游产业上。2001年，陈书记和村长带头下山，率先盖起了农家乐。当时有很多村民不理解，不愿离开土地。现在看来，这一宝是押对了，如今旅游已经成为草坪村的支柱产业。

谈及未来的发展，陈书记认为，草坪的未来还是在旅游上，现在的问题是草坪旅游属于季节性和“途经经济”，经营时间短，且留不住客人。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草坪的未来会很有发展。

张志军 2007年至今任草坪村村支部书记

张志军书记是1963年生人，1997年任村长，2007年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作为60后，张书记的思路更加开阔和灵活，在他心里最想做的也是最难做的就是为农民增收。

旅游和打工，这是张书记为草坪村量身设计的两个创收途径。草坪的耕地基本都在山上，年平均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因此不适合大面积地种植粮食。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深入，村里60%以上的耕地都已经变为林地了，已经没有大面积的土地用于耕种了。并且对于一个成年劳动力来说，打工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在家务农。可见，种地已经不是草坪村收入的主要途径了。

随着三江旅游景区的发展，村里的农家乐也越办越好。但与以前几户人家单独经营不同，要想成为全村人都能经营的支撑产业，草坪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张书记也说草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留不住人，游客多数都是在去三江景区的途中在草坪吃顿饭，基本不会住宿。这样旅游的收入就极为有限。张书记计划向政府申请一部分经费，由政府出钱，村里出工，在邻近的山上开凿一条游览的路线，并建设一些凉亭等景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客人。

思考：草坪的发展之路

通过三代村支书的访谈，对于草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从中也可以看到增加老百姓收入始终是村里带头人思考的重点。而对于草坪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首先，以旅游产业为主线的思路是没有错的，还可以通过专业管理、打造品牌等方式增加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但完全依靠旅游产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旅游受挫，对已经不再种地的村民来说打击太大。另外，打工的确是当前村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草坪目前幸福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村民基本都在村内打工，一旦村里的工程做完，村民需要到较远的地方打工，那么社会上常见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现象将在草坪重现。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必须要配合旅游产业增加另一个农民就业创收的渠道。我们建议重点开发猕猴桃、中药、腊肉、蜂蜜、野菜等土特产，通过招商引资吸引资金和专业的营销、管理团队，打造草坪品牌，形成具有草坪特色的绿色产业。

几代人的幸福观

不同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幸福首先要了解他对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为了更好的分析草坪村的幸福程度，我们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了走访，希望能够总结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规律性的幸福观。

40~50年代生人：好日子就是幸福

这是吃过苦的一代人。他们的幸福感来自与过去生活的对比。就像老书记说的那样，现在的日子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山上的野菜、树皮都被吃光了；文革时期，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那时候怎么敢想能顿顿吃上大米白面，顿顿都有肉呢。如今能踏踏实实的过上好日子，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

这一代人更为关注的是生活条件。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来分析，他们的需求在于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而这几样需求在现



大妈说，现在娱乐的时间都比从前多

在的草坪无疑都能达到满足。

60~70年代生人：活出个样才叫幸福

这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全家的生活。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这一代人已经不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他们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在村里的地位。

这一代人的幸福观已经从外化的生活水平发展到关注内心的愉悦。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析，他们的需求层次已经上升到尊重需求。而在草坪村，这种需求能够形成有效的自我激励，使得村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不断致富，并获得村民的尊重。

80~90年代生人：梦想成真才是幸福

这是有理想的一代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着自己的想法。我们接触到的几个年轻人，要么在学开铲车，要么在学厨师，要么在学种植水果，要么在学饲养家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家里改善生活水平，而在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幸福。

自我实现是需求的最高层次，也是许多年轻人幸福观的体现。

自我实现与人们的心里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在草坪村年轻人心理需求不高，他们认为自我价值可以在草坪村的快速发展中得以实现。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像城里父母一样，孩子的心理压力小。从目前村子的发展趋势，他们留在村里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



幸福要靠自己打拼

地震那几天

5·12地震是我一直不敢触及的一个话题，总担心会撕开他们已经愈合的伤疤。随着我和老书记一家的熟悉，一天早饭后，他主动和我提起了地震时发生的事。（以下以张书记的第一人称叙述）

“地震时我真是吓坏了。那时我们还住在山上，当时我在地里干活，地震发生后，先是跑回家去看你老妮（婆婆的意思）和孩子，还好家里人都

没事。随后相继了解其他家情况，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两个老汉受了轻伤。地震后，余震不断。房子已经不敢再住了。村长号召山上的几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就在山坡上扯起了帐篷，大家挤在一起，而村长家就住在帐篷的最边缘。

由于没有伤亡，大家的情绪还算稳定，相互讲述着各自逃生的过程。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和粮食，山上的水已经不敢喝了，能用的只有几家人水缸里攒下的干净水。粮食也不多了，我把自己家仅剩的三袋粮食都拿出来了，和大家一起吃。由于不知道救援队多久才到，大家商量后决定，水和粮食都定量供应：老人和孩子先吃，可以吃大米；其他人用玉米面掺着大米吃。我是村里的“老辈子”，年轻人都让我先吃，可我觉得我身体还行，从没和其他老人一起吃过，而是和年轻人一块吃。

三天后，村支书回来了。地震时他在西安出差，地震后他和村里失去了联系，他的第一想法是他可能是草坪村唯一幸存的人了。大家都劝他不要回去，但他说，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在等着我，即使他们不在了，我也要回去给他们收尸。几经辗转到了都江堰，所有的交通工具和道路都行不通了。他就沿着山路徒步往回走。一走就是两天两夜，终于走回了草坪。当他看到自己的家人和乡亲们时，40多岁的汉子嚎啕大哭。

村支书回来大家有了主心骨，也带了一些外面的消息。大家知道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目前只能靠自己自救。同时村支书也告诉大家，他在路上看见飞机了，估计是在输送救援物资，国家不会不管我们。

就这样，大家带着信念与期盼，在风雨中度过了七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因为分配不均抱怨过一句。这段‘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让本就和谐的草坪村更加的团结了。由于分配得当和大家的配合，七天里，全村没有断过粮、断过水。七天后，救援队伍带着救援物资和希望到达了草坪。

我们村大家向来和谐，平时就连小摩擦都很少。地震后，大家看的更开了。现在谁家有个大小情，招呼一声，大伙都来帮忙。地震让我失去很多，也给了我们很多。”

生日的烟火

不得不提及的是我与汶川、与草坪的特殊缘分。我到草坪的第一天恰好是我的阴历生日，我在

草坪的最后一天是我的阳历生日。这件事我和任何人提起过。因为马上就要离开了，我想可以送团友和村民个惊



生日的烟火

喜，也让大家记住我们曾来过草坪。于是我拜托一位老乡，到乡上去买些烟火。

后来这件事被村长知道了，也恰好要欢送我们，于是我的生日也成为当晚的一个主题。那晚大家再次跳起锅庄舞、唱起生日歌，还为我煮了长寿面。生日歌后，随着一声爆竹声响，璀璨的烟火划



分享的长寿面

破天空。这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一个生日，而“百村调研”恰如这场烟火，虽然七天的时间很短暂，

但足够绚烂多彩，它会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中划下美丽的痕迹，永远无法淡出记忆。

结语

草坪的调研结束了，我们在带走满满收获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能为草坪留下些什么。七天的时间实在太短暂，可能由于了解的不深入，我们的思考和建议还显得很稚嫩。我们会持续关注草坪，与草坪保持长久的联系，为草坪未来的发展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回京后的几天里，经常梦见草坪村，梦见乡亲们熟悉的脸孔，梦见团友们在一起讨论，梦见拿起熟悉的扫帚，梦见大家一起跳锅庄，梦见划过夜空绚烂的烟火……

茶马古道倚卧龙，水乡藏寨出蓉城。
百村调研进汶川，根在基层志前行。
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亲相爱其乐融。
问计民生谋发展，幸福草坪万象蒸。
七天欢乐苦与共，心缘难舍一世情。

图 沙玛建峰（国土资源部）
赵翔（国家质检总局）
孙宇飞（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陈慧（文化部）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2168683 联系人：魏皓阳 8219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gtgw>